



高端视点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时代特征与发展导向

李凤亮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当前,新型研究型大学已正式写入与国家宏观政策目标相一致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系统政策,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导向。国家在当前发展阶段提出这一概念,既是国家战略需求的集中体现、加快构建高质量创新体系的现实需求,又是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客观要求,更是大学组织结构演进的时代具象。

1 围绕时代特征 力扛历史责任

从“高质量发展”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需求。科技创新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关键变量。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居于首位,成为指导新时代发展的重要遵循。之后,中央不断强调科技、人才、创新驱动的重要性,特别是将科技自立自强摆在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力的首要位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为了推动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党和国家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高水平新型研究型大学肩负着培养创新人才和探索科学前沿的时代重任。国家希望新型研究型大学“做‘尖兵’”“闯进,对国家重大战略科技问题进行攻关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勇担时代使命,通过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产出高水平科技创新成果,支撑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从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到大学组织演进的知识生产革新使命。大学是现代社会中最为关键的知识生产机构,知识性是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之一。知识生产模式变革是大学组织知识演进的根本内驱力,对大学的学科结构、人才培养和科研组织方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新型研究型大学本质上属于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是大学组织分化的结果,也是大学系统适应社会需要的结果。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出现,是大学组织结构对知识生产、传播以及应用方式变革的主动应对。大学组织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全球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可扭转的趋势。当前,新型知识生产模式强调知识生产主体的多元性、网络性与

耦合性,知识创造发生在多元创新主体的互动与耦合的过程中,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创新生态系统。从学科组织结构而言,目前学科发展呈现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趋势,交叉学科越来越受到关注,研究型大学也对此高度重视。大学要打破传统学科组织界限,加强制度设计,增强组织的开放性,形成“扁平化”学科组织结构,顺应和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更要基于学科组织结构创新,先行先试、勇于探索,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探索构建有利于学科交叉合作、有利于解决复杂问题的新型组织结构及其制度体系。

新科技革命时代对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更多新要求,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以及自主获取知识和融汇跨学科知识能力,对于学生未来高水平、可持续发展愈加重要。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应需而变,革新育人理念、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在新技术加持下,对教学系统进行组织创新,设计新的学习框架。为适应学科交叉和跨界融通的需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学科组织模式更为扁平化和开放,鼓励引入和开发新的技术手段、研究方法,减少因专业壁垒和物理空间所带来的限制。

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视角到未来前瞻的创新驱动。纵观历史,前三次工业革命都成为新型大学产生的重要推动力。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德国的柏林洪堡大学,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是否会产生一类具有代表性的新型大学?大学模式和高等教育模式的演进,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两者间的关系发展有着一定的规律。从历史来看,每次变革中都会有不少大学进行探索和尝试,最终形成最适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大学形态。

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的“新型大学”,例如柏林洪堡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与同时代其他大学相比,它们当时也具有新型的特征。通过对大学形态的探索逐渐沉淀,他们最终成为成熟的大学形

势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要贯彻落实党委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发挥学校各级党组织在办学治校中的“定盘星”作用;要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把党建成效转化为育人成效、科研突破、服务贡献。

就治理构架而言,要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多元化治理体系,并进一步提升办学效能。如何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科学机制,构建地方政府和高校之间、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之间的新型关系,亟待进一步探索。同时,投入与管理主体、办学主体、行业管理主体这三种主体,如何更有效能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也需要进一步探索。

三是育才树人之“新”。如何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培养德才兼备的拔尖创新人才?新型研究型大学要构建起核心素养内化系统,致力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要进一步明晰人才培养目标,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形成具有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要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完善通识与专业贯通式人才培养新路径,建立“通专结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要积极拓展学科边界,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建立具有明显交叉学科属性的前瞻性课程。要用学术前沿启迪和增强“科研敏感”,设置学术前沿引领、研究方法训练、学生创新研究项目、学术表达能力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等模块,帮助学生在课程学习中提升研究思维、素养、视野、研究兴趣等,并将其与科学研究技能有效结合,转化为拔尖人才的科研实力,为他们未来在基础学科领域成为领军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四是视野融合之“新”。如何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化自信,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鲜明的国际化特征,要

态,并被世界范围内的大学共享,进而成为人类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特征在于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中实力对比的变化,世界经济中心转移,政治格局呈现非西方化和多极化,从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秩序和规则演变。这一变局的原动力在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颠覆性变革。在此时代大变革背景下,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探索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运而生、乘势而上。

新型研究型大学相关探索成功与否,尚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虽然现在不一定能准确预见未来大学的发展模式,但我们可以进行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探索,并为后来者积累经验。随着国力的强盛,我国正逐步成为知识创新的全球中心,这也给了我们在世界高等教育舞台贡献中国探索的机遇,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进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探索,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贡献力量。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服务国家,放眼全球,在日益复杂的国际文化交流中保持高度文化自信。要具有全球意识和融通思维,要直面不同观点、文化碰撞交汇时产生的问题与张力。从世界格局的高度,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为引领,将中国文化和观点浸润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为代表的等一批具有新型研究型大学特征的高校,在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中,以较快的发展速度,在人才培养、科研、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崛起之路,凸显了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虽然几所学校的发展背景不太相同,但总体上都呈现办学时间短、高起点、研究型、对外开放程度高、小而精等诸多鲜明特点。

新时期,新型研究型大学不仅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且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创造一流学术成果,肩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重任。面对难得的历史机遇,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一步创新路径,在一流办学体制机制、一流学科建设、一流人才培养、一流科研平台建设上,先行先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制图 中国教育报 王萌萌

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党和国家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实施的关键举措。近年来,在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方面,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高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从长远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还应当着意于研究型大学转型升级发展下的“模式”创新,新型研究型大学应成为大多数“双一流”建设高校顺应新时代、承担新使命、实现新发展的共同追求。

“三大特征”凸显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时代价值

回应我国高等教育政策“新情境”。自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我国研究型大学政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全国教育大会以“九个坚持”确立新时期教育发展基本原则;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大学治理现代化提供新方向等。面对新环境、新需求、新任务,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对我国高等教育顶层设计的有效落实,是我国高等教育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性举措,是我国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应然要求。

凸显研究型大学“新使命”。在科学研究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进一步深化基础研究,同时要进一步聚焦量子信息、网络通信、人工智能等重大创新领域和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空天科技、深海深海等前沿领域发挥关键性作用。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新型研究型大学要为我国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智力支撑,为国家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关键领域从“0”到“1”的历史性突破作出贡献。在人才培养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要以超常规方式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际顶尖科技人才。在办学体制与办学模式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要以投入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为抓手,发挥高等教育“试验田”功能。可见,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不仅是对我国重点大学、重点学科等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继承与超越,更意味着“双一流”建设的提质增效、赋能赋能,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一招。

契合世界研究型大学转型“新趋势”。柏林洪堡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崛起反映了大学对确立“研究”功能到主动“为社会服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历史跃迁。新科技革命下,各国研究型大学正经历深刻变革,新型研究型大学面貌虽然尚未完全显现,但轮廓已然清晰。在较长时间里,作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后来者”,“仰视”和“引进”成为中国研究型大学的突出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不仅实现了从“精英化”到“普及化”的过渡,而且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跨越。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真正崛起,大学发展模式的成熟与创新是重要标志。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不仅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性突破,同时也是力求通过研究型大学的“中国模式”为世界高等教育贡献“中国经验”。

“三原则”擘画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蓝图

当前,对于什么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怎样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学界尚未取得共识。在此,不妨以三个首字母为“1”的英文单词 Innovation (创新)、Internationalization (国际化)、Interdisciplinarity (学科交叉)来阐释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三原则”。该原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而且让我们明确了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重点和方向。

创新——进一步推动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中央财政委员会第九次会

陈兴德

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当成为共同追求

议强调,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主要靠创新,核心是科技创新,研究型大学在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当前,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双一流”建设方案,努力将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思广益,作出战略性安排,尽早取得突破,力争实现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从跟跑向并行、领跑的战略转变,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创造更多竞争优势。

国际化——进一步深化研究型大学国际化。在后疫情时代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我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只有不断加强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交流,不断吸收国际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学习借鉴世界著名大学办学治校育人的成功经验,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达到世界高等教育的最先进水平。另一方面,提高大学的国际化水平可以进一步提升我国大学的国际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发挥我国大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知识引领和人才支撑作用。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还需要我们把国际化融入到大学教学、科研和服务的各项工作中,把国际化看作大学发展的起点和归宿,更加重视大学国际化精神、制度和文化的建设。

学科交叉——进一步实现研究型大学学科交叉。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与发明大多是学科交叉的成果,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新的生长点和新学科的产生往往是不同学科彼此交叉和相互渗透的结果。事实上,知识生产方式变革同样发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交叉学科的出现是二战以来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反映,它标志着“以问题为中心、以应用为导向、以满足社会需求为优先原则,突破传统学科组织、制度、文化壁垒时代的到来。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学科的优先顺序由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知识变化为技术知识、应用科学、基础科学。高等教育由注重学术本位到更加重视社会本位,更加强调知识的应用价值,更加强调大学为社会做出的现实价值。为应对知识生产模式变迁和学科制度危机,发达国家的大學主动进行去制度化改革,建立了许多跨部门、跨学院、跨学科的横向组织。

实践证明,多科性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往往容易产生新兴学科,也容易在学科交叉地带产生重大研究成果。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对我们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促进传统研究型大学转型发展提出了迫切而明确的要求。如何创新学科组织形式,更好地适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内生要求,成为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的关键。

(作者单位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